

我们曾经年轻

作者：董丰

探亲

(上接2023年9月15日第B4版)

牧区学大寨

讲到文革中的大草原，不能不提及当时的牧区学大寨运动。

锡盟草原水草丰美，气候恶劣，畜牧业一直是那里的经济发展重心。我们年年围捕狼群，造成田鼠肆虐，草场退化，但是由于冻土层没有被破坏，草原没有沙漠化。狂风可以吹起指甲盖大小的石子，但是并没有扬尘。

文革中一切经济发展都要“以粮为纲，以钢为纲”，“备战，备荒，为人民”。1969年，锡盟掀起了牧区学大寨运动，要开发农业，扩大粮食生产。各旗纷纷响应号召，开始在草原开辟农田。我们巴彦塔拉大队也划出一片地，开荒播种小麦。地是张文学开着拖拉机开垦的。种子播撒可能有赖于其他汉人。

到了收获时节，收割麦子的工作交给了几个蒙古族牧民，估计是有意向他们灌输学大寨的思想，让他们学习农耕技术。他们拿着吃肉用的蒙古刀，蹲在地上一棵一棵地割下麦子，打出的粮食据说还没有种子多。各地的自然条件不一样，根本没有必要追求同样的经济模式。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我仍然不能认同把江南的沃土农田铺上水泥，到高原的冻土层开荒种地的经济布局。

巴彦塔拉地缘辽阔，我不清楚农田开垦在哪里。但是在两次送伤病知青去锡林浩特治疗的路上，看到其它公社开垦出的矩形地块光秃秃地散落在绿色的原野中，像是草原母亲身上的疮疤。草原的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如果冻土层被破坏，就会造成沙漠化。但愿牧区学大寨没有给草原带来不可修复的伤害。

写牧区插队的经历时，顺手在网上查看锡盟的消息。看到如林的风力发电站，看到锡林浩特城市面貌的巨大改观。接着查找阿尔善宝拉格的消息，她成为锡林浩特市的一个镇，阿尤拉海还有了工人电影院。相比当年，草原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想必牧民的生活条件也有了极大的改善。

阿尔善宝拉格镇的介绍材料里讲到那里石油和褐煤储量丰富，成为国家级能源基地。人口达到6300多人，几乎是当年的十倍。人们垂涎于那里30多种金属和非金属的丰富矿藏，认为有较高的开采价值和市场前景。接着在卫星图片里看到近年的露天采矿给草原留下的巨大的丑陋的伤疤。

我发现网上有很多关于内蒙草原深度污染，矿山开采严重破坏草原生态和草场退化的报导，不禁心惊。但愿在急功近利，各自为政，贪婪无序的经济开发大潮中，蒙古族人民世代赖以生存的大草原不要被不可逆转地破坏。人类对大自然的过度索取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惩罚。锡林格勒草原牧场属于草原牧民。

1970年夏天韩莉莉病了，我带她去锡林浩特看病。

我们借住在汉族牧民老曹在锡市的家里。他的女儿热情地招待我们，给我们安排了食宿。公社医生怀疑韩莉莉是心脏病，锡盟军分区医院检查后没有结论。我想带她回北京看病，她说感觉好一些，等父亲从五七干校休假时再回京团聚。

为了照顾病人我把牛群交给了别人代管，心里没有牵挂。两年没有回家了，把病人送回大队，我决定借机回京探亲。

从锡林浩特乘汽车西行到集宁时刚好碰上了沙尘暴，黄沙遮天蔽日，当地人称为“黄毛风”。汽车已经进入市区，而我浑然不知，好久才从车窗里隐隐看到路边近在咫尺的民房。

火车上没有座位。我裹着蒙古袍，在靠近车厢门的地上一直坐到大同，再转车向南到东榆林车站。我想绕道看看在雁北农村插队的姐姐，再回北京。

下车后向路人打听去薛团公社罗庄大队的路，正巧遇到了同车到达的罗庄知青杨百揆。我们同行5里走到了村子。姐姐没有预先知道我的造访，惊喜万分，激动的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我身穿蒙古袍，脚上是脚尖上翘的蒙古马靴，里外衣服多日未换，油垢和虱子都不少。姐姐让我洗澡，换上她的衣服。她帮我把脏衣服洗净，放到知青食堂的蒸笼上，和同学一起烧着柴火，拉起风箱，彻底地给衣服消毒灭虱。姐姐又煮了中药百步草，让我洗头消灭头虱。我立时感到从上到下一身清爽。久违的亲情回到身边，我孤独的灵魂又有了依伴。

姐姐已经在贫困的雁北农村插队一年半了。山西省雁北最穷，山阴县又拔了贫困县的头筹。女附中和男校四中是北京的二尖子学校，文革中成了“修正主义”典型。这两个学校到山西插队的学生，自然要被分到最穷的地方，接受最艰苦的锻炼和改造。

罗庄知青点是一排十二间的窑，分成四套，姐姐住的窑在从西边数第二套。进门是堂屋，放工具杂物，左右套间住人。窑是知青自己动手，在老乡的帮助下用土坯垒盖出来的，需要木料极少。从屋子里面看和陕北的窑洞一样，黄土墙，黄土窑顶。他们的床板和床凳还是从北京买来木头，知青自己打造的。男知青是四中初中66届学生。女知青都是女附中高中67届的学生，大多数是姐姐同学。这些大姐姐们对我这个不速之客十分热情，让我享受到在内蒙少有的亲情和温暖。

知青家里从牧区来了客人立刻成了大新闻，村民都来围观，呼啦啦站了一院子，老乡们要看看被高原的日头晒得黧黑的妹子。我的马靴放在堂屋里成了稀罕物，每人都要把脚伸进去去体验一番。直到去年罗庄知青回村访问、捐赠图书时，还有乡亲提起当年看到

蒙古靴时的好奇和兴奋。

小住两天以后，我告别姐姐回京。火车在晨曦中缓缓驶入永定门车站，那是我两年前告别家乡，告别母亲的地方，没有往日的喧嚣，在夏日的清晨里显得格外宁静。走出车站，原本熟悉的城市让我感到陌生，周围的一切以前都和我密切相关，如今我是外地人，这里的一切都不再属于我了。呼吸着家乡的空气，开始嗅到了自己蒙古袍上淡淡的腥膻。奇怪怎么在草原上竟浑然不觉。

事先没有告诉妈妈我要回家探亲，一方面是因为最后决定回京很仓促，信件又走得慢，另一方面有一种调皮的心态想给她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到家正是早晨起床的时候，走进四合院，推门进屋，看到母亲起来了，背对着我在床边拿眼镜。妹妹已经醒来，还没起身。我站在门口，轻轻地叫了一声妈妈，等待着她的反应。她惶惑地转过身来，半天认出是我，只说了一声“诶呦”，叫了我的名字，就走过来用双手紧紧搂住我，哭了起来。

我的变化太大了，服饰只是一方面。在她眼里，我一头浓密的黑发变成了没有光泽没有弹性的枯草，细润的脸庞变得黝黑粗糙，原来黑亮的眼珠被风雪涂染变黄，而白眼球上挂满了血丝。由于两年里严重缺乏维生素，我的手指甲也都是塌瘪的。这哪里是她两年前送出去的女儿。她后来经常提到我当时的容貌，和她深深的心痛。

妈妈伤心得说不出话来。我笑着安慰她：“妈妈，我不是挺好的回来看你了吗？”其实眼角也开始湿润。我庆幸在山西的逗留已经让我干净了很多，不然对妈妈的震撼可能更大。

当时父亲在五七干校下放劳动，家里只剩下妈妈和11岁的妹妹。北京轻工业学院的学生都分配走了，妈妈离开了“牛棚”可以天天回家。我回归汉女生活，“脱我战时袍，穿我旧时裳”，充分享受母亲身边短暂的温馨和快乐。我请了一个月的探亲假，抓紧时间给母亲讲草原的故事。我描述着内蒙的风情，我的马我的骆驼我的牛群，我的快乐我的烦恼，大自然的挑战和我战胜困难时的得意，……我证明了我的承诺，直面人生的艰辛，有人类生存的地方我都可以活下去。

我和几个中学同年级的同学联系上了，她们都在外地工厂工作或者插队，正好在京探亲或者培训。我们到颐和园聚会，在湖光山色中讲述各自的经历，畅谈人生。

准备回内蒙时，我感觉不舒服。妈妈让我去北大医院检查一下身体。在乘车去医院的路上我不得不中途下车呕吐，开始感觉很不好了。医生诊断我得了急性黄疸型肝炎。

医生说肝炎的潜伏期有45天。推算回去，正是我带韩莉莉去锡林浩特看病的时候。我的发病症状和她如出一辙。妈妈怪我没有起码的医学知识，不懂得和病人隔离。公社医生怀疑她是心脏病，锡盟军分区医院也没有做出诊断，我根本没有想到她得的是传染病，一直和她同吃同住。

(本文收录进“纪念上山下乡50周年”系列丛书《永远的青春》。本报经作者授权刊载，版权归属作者。)

——待续——